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

——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

边燕杰 张展新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征和重大成果。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怎样理解这些变化？本文以这一问题为主题，从中西学术对话的意愿出发，在介绍和归纳美国社会学者关于转型国家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关系主要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互动”的观点及相应的研究假设。笔者对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结果支持了该研究假设。

关键词 市场 收入分配 政府职能 人力资本

作者边燕杰，1955 年生，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张展新，1955 年生，社会科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

市场化是过去 20 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征和重大成果。经济学家林毅夫、蔡 、李周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证实，中国经济已由典型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本文作者关心的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是，怎样理解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国内社会学界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①。国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美国社会学者关于市场转型及其后果的学术论战上。这一论战自 1989 年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发表，一直持续至今。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和归纳这一学术论战中关于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主要论点并提出市场发展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互动的观点，同时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中的城市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有关的研究假设，以期引起国内外学术对话，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

一、西方社会学文献中关于市场化及其后果的主要论点

什么是市场化？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何？在市场转型及其后果的学术论战中，产生了各

* 本文的资料分析得到了李实研究员的大力支持。整个分析和写作过程由香港大学资助局两项基金（HKUST6052 98H、HKUST6007 00H）和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在此一并鸣谢。

① 参见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年）；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载《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3 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种。第一, 市场化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更, 是由再分配变为市场机制的过程, 简称为市场转型论。第二, 市场化的本质是经济产权及其安排的变化, 是由国家产权变为地方、组织或个人产权形式的过程, 简称为产权变形论。第三, 市场化不仅是经济机制、经济产权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的过程, 简称为政经双变论。

市场转型论的代表人物是倪志伟 (Victor Nee)。倪志伟自 1989 年以来发表数篇论文, 阐述和修正他的论点, 并做了大量实证分析^①。他认为, 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有根本的不同, 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将不同。在再分配体制下, 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是靠行政命令协调的: 通过中央计划和等级组织体系, 经济剩余被集中到国家, 然后按照国家的目标进行再分配。在这一体制下, “再分配者倾向于满足自己”^②, 所以受益最大的是等级体系中拥有行政权力、实施再分配的各级官员。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 在那里“直接生产者占有大部分剩余”。因此, 在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的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控制资源和占有经济剩余的权力也发生转移, 即从党政官员转向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市场转型论有两个基本推论, 一是人力资本升值假设: 在市场化进程中, 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资质的经济回报呈上升趋势; 一是政治资本贬值假设: 相对于人力资本回报, 党政官员的经济收入呈下降趋势。

产权变形论的倡导者魏昂德 (Andrew Walder) 指出, 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并不能直接决定经济剩余如何分配。这是因为,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作为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 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 地方官员在经济建设和市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将使他们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 进一步获得实惠。只有在“放权让利”的收益者是“直接生产者”(工人、农民)的条件下, 市场转型论预测的权力贬值和人力资本升值才会出现。所以, 魏氏提倡研究各地方的“产权体制”(property rights regimes), 并由此推断市场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④。

政经双变论的主张来自对中国市场化的实地观察和理论概括。边燕杰和罗根^⑤指出, 中国的

① See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Oct. 1989), pp. 663—681; 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June 1991), pp. 267—282;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908—949; Yang Cao and Victor Nee,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4 (Jan. 2000), pp. 1175—1188;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8 (1999), pp. 799—834;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ostsocialist Inequality: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Forthcoming, 2002).

②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Oct. 1989), p. 678.
ibid., p. 666.

④ See Andrew G. Walder, Evolvi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Beverley Hooper (eds.),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3—18; Andrew G.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 (Sept. 1995), pp. 263—301; 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1060—1073; Andrew G. Walder and Jean Oi,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ina.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4.

⑤ Yanjie Bian and John R.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Oct. 1996), pp. 739—758.

经济改革是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条件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所以市场机制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升值，而行政机制又维系了政治资本的力量。白威廉和麦宜生^①认为，中国的市场化产生了“政治市场”，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作和交易，这类行为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而蔓延。所以，政治市场中的权力、地位、层级等等，都是个人获得利益的条件。周雪光^②认为，市场的发展是与政治利益密不可分的。这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两个方面：市场力量削弱再分配机制，但政治利益和政治体系通过建立、实施和改变制度安排而影响市场的扩展。这些观点都意味着，在市场化进程中，干部的特权以及相应的收入优势不会下降，甚至有可能上升。

泽林尼和科斯泰罗 试图使这场关于市场转型的论战从尖锐的对立中走出来。他们从动态视角提出了市场发展的历史的、多维的“市场渗透” (Market penetration) 的论点，认为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渗透有三种类型。早期的市场渗透主要发生于再分配体系“边缘地带”的简单商品交换，如小商品和劳务在地方的流动与交易，这样就出现了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商品市场。在这一时期，进入市场的小生产者的收入提高，导致全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如果市场继续渗透，将导致商品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力、资本市场的形成，从而出现一个再分配经济为主导、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并存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相对于这两种市场渗透，第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最为彻底，这就是以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为标志的“市场整合”的经济或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在这一阶段，旧的官僚精英阶层已经分化，拥有技术和管理才能的官僚成为社会上层的一部分，而其他精英则沦落了。这时，不平等大幅度上升。泽林尼和科斯泰罗没有断言这三种市场渗透类型代表了一个必然的逻辑顺序，而指出这是一个经验观察——东欧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变化确是按这样一个次序展开的，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参照。

二、市场化与政府职能转型的互动：我们的观点

要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观点，就必须准确地透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有两个主线。第一，市场化是多维的，即不同的市场形态以不同速率发育；第二，伴随着市场化，政府经济职能发生转变，从直接的行政协调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

市场化作为多维的历史进程

虽然中国尚未成为泽林尼和科斯泰罗所说的资本主义导向经济，但他们关于市场演进的多维的、历史的观点基本适用于中国改革所走过的历程。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城市的农贸市场即可被视为最初的地方商品市场。随后，个体商店、餐馆、街头小贩等逐渐增多，进入市场调节范围的商品和劳务趋于扩大。生产资料的流通经历了 80 年代中后期的“双轨制”，到 90 年代初，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已经放开。可以说，到 90 年代中期，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已不再由计划确定，而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一个完整的产品市场体系已经确立。

① William L. 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1042—1059.

② 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4 (Jan. 2000), pp. 1135—1174.

Ivan Szelenyi and Eric Kostello,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1082—1096.

相对于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滞后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统一安置工作, 个人无权选择工作场所, 也无权调换工作; 城市职工因而对行政安排的工作场所形成了制度性依附关系^①。这种城镇劳动力管理体系在80年代一直延续着, 但从那时起, 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开始催生劳动力市场^②。“人才市场”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人员流动创造了条件。这些变化虽然是零星的、局部的, 但毕竟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在80年代开始形成。1992年以来的变化是显著的。一方面, 城市劳动力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对于个人求职、离职、调换工作的限制已基本解除; 另一方面, 在国有企业无力扩大就业、甚至内部不断出现“下岗”的同时, 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此外, 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因此, 到90年代中后期, 虽然在国有部门内部, 职工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用人单位的依附关系, 但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 并对劳动力流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调节作用。

资本市场的发育要比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还慢一些。在80年代, 国家控制着资金的流动与配置, 政府是主要的投资主体, 金融活动是在行政协调下进行的^④。有所突破的是, 外资开始涌入部分沿海地区^⑤。同时, 民间信贷在一些地方出现, 譬如温州^⑥。1992年以后, 情况大为改观。股票市场迅速发展, 外资投入迅速增长, 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⑦。与这些进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多少改进的国有金融体系: 听命于政府的国有银行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还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因此, 与股票市场相比, 信贷市场的发育滞后。从总体上看, 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但政府对资本流动的干预依然大大超过对劳动力的干预, 这种干预为官员“寻租”提供了条件^⑧。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当经济体制由再分配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换时, 政治演进的逻辑主线是清晰的、可观测的, 这就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虽然随着计划经济的衰落和市场的发展, 政府体系逐步失去了再分配功能, 但国家并没有完全脱离经济活动, 而是开始扮演与过去不同的角色。首先, 在市场化进程冲击各个领域的同时, 政府改变了经济管理方式, 从行政协调为主转向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为主。1992年以后, 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削减直接管理生产活动的主管部门, 强化综合经济部门。例如中央政府撤销纺织部、轻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化工部等, 并加强金融、

①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② Thomas B. Gold, Urban Private Business and Social Change. In Deborah Davis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7—178.
Deborah Davis, Job Mobility in Post-Mao Cities: Increases on the Margins.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 1992), pp. 1062—1085.

④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⑤ Nicholas R. Lardy, Dilemmas in the Patter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1978—1985.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78—305.

⑥ Yi-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June 1992), pp. 293—316.

⑦ 参见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 ——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载《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54期; Nicholas R.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8.

⑧ 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财税、工商行政管理等机构。到 1998 年，代表传统的等级式计划经济的行业主管部门几乎都实行了公司化。

第二，虽然市场化意味着非国有企业进入生产领域，但国家对一些重要产业保持了垄断控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的主要产业都是由国有单位经营。自 80 年代起，一些产业开始对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开放，如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另一些产业则至今没有开放，或者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类产业包括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产业，如邮电业、铁路运输业和电力制造业；与经济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产业，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有关的产业，如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事业。这些产业依然严格限制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结果是中国的产业被分割为两大领域：一是开放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其中展开竞争；一是国家垄断领域，主要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来经营。^①

第三，在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国有企业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产权和经营权。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早期的承包制到后来的股份化改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负责人拥有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包括行政和事业单位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自主权，可自行组织“创收”并形成预算外收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无疑提高了企业干部的企业家资质和管理能力。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依然主要由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考察、任命，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官员”身份脱离出来，成为一代改革企业家。行政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更谈不上这种独立性。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性的变化：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无论企业干部还是行政干部的收入都与其行政级别挂钩，由国家预算列支；而在改革时代，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各类国有单位负责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单位的绩效，与各种“盈利”能力相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凭借计划手段的“国家再分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

三、研究假设和分析步骤

我们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市场扩张和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交互作用在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尤为明显。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是在这一期间建立起来的，那么，它对收入分配的格局是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经济组织分化三个角度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②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当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或受到较大限制的时候（如 80 年代中期），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保持甚至扩大了平均主义倾向。这时，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对教育的经济回报不高^④。1992 年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个人在工资报酬上讨价还价的空间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就像市场转型论所预测的那样，对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企业家资质、技术专长、高等教育等的经

① 在本文中，党政机关（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政治团体）被视为一个“产业”，并归入国家垄断领域。

② 根据林毅夫、蔡、李周等的研究，到 90 年代，产品市场已基本形成。但是，商品和服务由市场调节的比重（相对于行政调节）是一个很难测量的概念，缺乏相应的资料，故本文不将其作为一个视角。

Andrew G. Walder,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China Quarterly*, no. 109 (March 1987), pp. 22—41.

④ Yu Xie and Emily Hannum,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950—992.

济回报将逐渐提高。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一定对党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收入优势构成负面影响。在国有单位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由于政治可靠或个人资质，党员可能继续占据较好的工作位置，而干部凭借其权力和组织资源继续保持收入优势。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各类官员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管理市场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兼职来获取收入。这样，可以做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 劳动力市场越是发展，对文化教育、技术专长、企业家才能等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越高。

假设 2. 劳动力市场越是发展，对中共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为代表的政治资本的经济回报越高。

资本市场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显而易见，基于私人产权和公司产权的资本市场的扩张提高了各种形态的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别是与资本运作直接相关的人力资本价值。同时，资本市场的发育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组织的行政性的资金配置，从而弱化了某些官员的权力。但是，由于国家干预、特别是对投资的干预和限制的广泛存在，资本市场扩张给行政精英和管理精英利用职权“寻租”、挪用资金等“非生产性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有助于提高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强化着职能干部的收入优势。我们据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3.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提高对文化教育、技术专长、企业家才能等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

假设 4.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提高对中共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为代表的政治资本的经济回报。

经济组织分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体制改革使经济组织的权力和优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 80 年代，国家垄断领域中的大部分经济组织基本上处于传统的行政控制之下，预算外收入数量很小。1992 年以后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各类市场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对垄断性产品的需求，使各种垄断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具有垄断性）的利润或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时，党政机关也在利用国家赋予的对市场活动的干预权力，“设租”、“寻租”，“创收”手段繁多^①。这些垄断性收入或权力性收益首先是作为组织收入，然后大部分分配给单位的领导人，最后分配给技术人员和一般职工。结果是，垄断行业形成了个人收入优势^②。

对开放领域的国有企业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 80 年代，新兴的非国有企业尚处于成长初期，规模普遍较小，竞争力有限。而国有企业受到倾斜政策的保护，在原材料供应、投资信贷、利润留成、财政补贴等方面享受优惠。得益于这种倾斜式资源配置，国有企业一度保持了较高的盈利，职工的工资和非货币收入水平也较高^④。1992 年开始的新的改革浪潮改变了这一状况。一方面，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家调整了政策，大幅度减少了对国

① Yimin Lin and Zhanxin Zhang, Backyard Profit Centers: The Private Assets of Public Agencies.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03—225.

② 许明主编《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年。
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④ 邓英淘等：《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

有企业的资源倾斜，硬化了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①。这样，竞争对手的强化和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弱化使国有企业的盈利急剧下降，职工收入水平随之锐减。至于早已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作为“二国营”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它们一般规模较小，且享受的政策优惠较少，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衰落的速度要比国有企业更快。总结以上讨论，我们提出最后三个假设：

假设 5. 在 1992 年改革之后形成的产业分割中，垄断领域国有经济组织的收入开始高于开放领域国有企业的收入。

假设 6. 新兴的非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高于开放领域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

假设 7. 城市集体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开放领域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

我们将借助 1988 年和 1995 年 55 个城市的居民收入调查^②（以下简称“城市调查”），分两步检验上述研究假设。第一步，假定市场化进程及其收入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是同步的，或者说不存在城市间的差异，我们运用多元回归统计模型做全国性的收入变化趋势分析，考察从 1988 年到 1995 年，影响收入的主要参数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步，我们放弃“市场化同步性”的预设，将 55 个城市的市场化水平作为变量，利用 1995 年调查资料来分析市场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城市差异，方法是运用“层级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来确定收入参数与城市市场化程度的相关关系。我们在这两步分析的同时介绍有关变量。

四、1988 年到 1995 年的趋势分析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

我们的收入指标是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我们用离散系数度量收入不平等，这个系数与基尼系数异曲同工，但更便于计算。表 1 显示两个年份之间的收入上升趋势：平均名义年收入由 1988 年的 1 929 元上升到 1995 年的 6 839 元，增长了 2.5 倍；如果按照可比口径计算，则增长了 50%。然而，收入不平等也在扩大：用离散系数度量的收入差别在同一时期增加了 9%—10%。这组数字展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从 1988 年到 1995 年呈明显上升趋势。

① 华而诚：《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年。

②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均包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两个部分，但本文只使用这两个年份调查资料的城市部分。关于这两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参见赵人伟和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1988 年城市调查样本包括北京、安徽、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云南。1995 年的样本增加了四川。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不是全国性的，但 11 个省份来自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改革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区域，涉及了 55 个城市和少量的县城，很具代表性。我们的分析要求市、县总体资料，由于县城的总体统计资料不如城市完整，故未把样本中的县城纳入研究范围。比较 1988 年和 1995 年的样本中，有 35 个城市是相同的，其特点是规模较大，均为地级市以上的城市。有 20 个城市是两个样本中不同的，县级市多一些。分析中如果把这两组不同的城市删除，就会减少县级市这一层次，降低资料的代表性。故我们保留了这些城市，即使用了这两个年份的 55 个城市的资料。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1988 年数据包括 16 887 个有工资收入的受访者，1995 年数据包括 11 044 个有工资收入的受访者。受访者的年龄范围为 16 岁至 69 岁（调查时填答的年龄）。

我们没有区分“基本工资”和“其他工资”。第一，这两个概念适用于国有单位和城市集体企业职工，但不适用于新兴的经济组织，例如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第二，在 1995 年调查中，许多受访者填答了“总收入”，但没有填答更细的分类。因此，年总收入这个指标的信度要高一些。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假定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从 1988 年到 1995 年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且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城市间是同步的,我们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来考察收入分配格局在两个年度之间的变化。具体地说,我们关心的是,对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个人特质变量的收入回报是如何变化的?各阶层和就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就此分为两部分叙述分析结果。在分析时,将收入换算成对数形式,以便用百分值来解释和比较回归系数。

1. 对个人特质变量的收入回报

政治资本的两个测量指标是中共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前者标志个人的政治归属,后者表明在经济组织中参与或影响分配决策的能力。干部多数是中共党员,其政治资本基于职权,也包含职权派生的政治影响。人力资本的指标可以是多层次的,包括教育、训练、经验等等。但是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城市调查只有受教育程度一项,从小学到大专以上设立了几个层次。在统计分析上,我们把党员、干部、教育都做“虚拟变量”处理。这样便于比较分析,例如,初中教育是受访者所受教育的中间层次,所以“初中”在统计分析中作为教育虚拟变量中的参照变量。关于教育程度,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中等职业学校、大学或更高水平的教育,这些特质标志着个人所受到的专门训练和人力资本投资。

关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解释,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这一解释基于 Mincer 的观点:教育程度表明生产性知识和技能水平^①。对于教育程度,还有其他一些解释,如 Arrow 和 Spence 强调教育证书的“信号”作用,视其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挑选雇员的实用手段^②,而 Bourdieu 把教育解释为继承和传播统治阶级、社会上层的惯习 (Habitus) 的一种文化资本。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今天, Mincer 的解释是符合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领域的现实的,即教育回报的基础是生产者和管理者对企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种回报就是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报酬。这也是本文以教育为人力资本指标的理由。第二,行政机制是否也可以提高教育回报?周雪光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并认为这是解释中国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回报上升的一个困境^④。我们认为,本文用具体的、可操作的市场化指标,而不是时间或区域的简单划分来度量市场化,有助于解决这

表 1 总收入均值、标准差和离散系数 (1988 年和 1995 年)

统计参数	1988	1995
按问卷填答数字计算		
均值	1 929.57	6 839.53
标准差	1 121.23	4 675.91
离散系数 (方差/均值)	.58	.68
按可比口径计算 (1978=100) [*]		
均值	1 019.43	1 531.11
标准差	554.77	968.91
离散系数 (方差/均值)	.54	.63
个案数	16 887	11 044

^{*}可比数字是问卷填答数字除以各样本省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得出的。消费价格指数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 225 页。

① Jacob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Kenneth J. Arrow, High Education as a Filt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2 (July 1973), pp. 193—216; A.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7, no. 3 (Aug. 1973), pp. 355—374.

Pierre Bourdieu,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5, pp. 241—258.

④ 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no. 4 (Jan. 2000), pp. 1135—1174.

一困境，因为这样把教育回报与市场形态的发展联系起来。^①

此外，我们的模型还包括一些社会分层分析常用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便获得主要解释变量的“净”效应。性别（男性=1，女性=0）用于检测收入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②，也正在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关注点。年龄是工作经历的代理变量。虽然年龄包含人力资本的涵义，但也有其他一些解释，因为中国过去有关收入的行政安排主要是按照工龄进行的^④。另一个控制变量是有关个人就业身份的，分为长期工和“其他”两类，后者包括临时工、农民工等。最后，55个样本城市作为控制变量，以北京为参照城市做虚拟变量处理，以便估测收入差异的全国平均水平。

在表2中，模型1估值结果显示，无论是1988年还是1995年，当性别、党员身份、教育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具有非线性的正效应（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为负）。当年龄、党员身份、教育程度保持不变时，在1988年，男性相对于女性的收入优势为12.4%（ $e^{0.117} = 1.124$ ）；在1995年，这种优势为13.5%（ $e^{0.127} = 1.135$ ）。这一增幅很小，并不具有统计推论意义。这个结果表明，在市场化条件下，男女收入不平等没有扩大或缩小的趋势。

模型1所显示的党员身份效应和教育程度效应表明，在市场化过程中，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都在上升。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之后，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在两个年份都是正的，而且1995年的数值高于1988年；并且，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推论意义。与非党员相比，1988年党员的收入高出9.7%（ $e^{0.093}$ ），1995年党员收入高出12.9%（ $e^{0.121}$ ）。教育程度效应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初中毕业生，所受教育为小学或更低的受访者的收入下降了：1988年后者为前者的87.9%（ $e^{-0.128}$ ），而1995年仅为71.6%（ $e^{-0.206}$ ），即初中毕业生如每月能挣1000元，则小学毕业生挣716元。同样以初中毕业为参照，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的收入在这7年中是相对上升的。以大专以上教育为例：1988年收入比初中毕业生高10.2%（ $e^{0.97}$ ），1995年则达到31.7%（ $e^{0.275}$ ）：如果初中毕业生月收入是1000元，则大专以上毕业生的月收入是1317元。这些有关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据支持假设1到假设4。

2. 职业阶层之间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

个人的职业身份和就业部门是我们关注的结构特征变量。职业的类别包括干部（已定义）、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办事员、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等几类。这里，“企业家”指的是私营企业的雇主或经理^⑤。

我们对行业的分类是按此前提出的产业分割观点进行的，目标是划分出垄断和开放两大部

① 本文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时，林南教授和李培林教授都指出这一解释困境。他们的疑问和提示促使作者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在修改论文时增加了这一段落。

② Margaret Mooney Marini, Sex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1989), pp. 343—380.

See Barbara Entwisle et al., 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1 (Feb. 1995), pp. 36—57; Barbara Entwisle and Gail E. Henson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④ Davis-Friendmann D.,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11 (April 1985), pp. 177—201.

⑤ 需要说明的是，对1988年调查资料而言，当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私营企业雇主”或“私营企业雇主兼经理”时，他（她）被视为企业家；对1995年调查资料而言，当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私营企业雇主或个体户”或“私营企业雇主兼经理”时，他（她）被视为企业家。由于这两个年份问卷设计本身的差异，本文的“企业家”定义也无法完全一致。这就给分析和解释带来了困难。

门。按照 1979 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相继发布的有关文件和数量化资料，我们做了部门划分（结果见附录）。开放部门包括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其他行业为垄断部门。

表 2 总收入非标准化回归系数，1988 年和 1995 年

自变量	总收入自然对数 (因变量)							
	回归模型 I				回归模型 II			
	1988		1995		1988		1995	
个体特征								
年龄	.079	***	.084	***	.072	***	.076	***
年龄平方	-.001	***	-.001	***	-.001	***	-.001	***
性别 (男性= 1)	.117	***	.127	***	.101	***	.116	***
共产党员身份	.093	***	.121	***	> .068	***	.081	***
小学毕业或更低 ^a	-.128	***	-.206	***	< -.096	***	-.142	***
高中毕业 ^a	.028	***	.101	***	> .010		.055	***
中专毕业 ^a	.061	***	.207	***	> .013		.093	***
大专或大专以上 ^a	.097	***	.275	***	> .040	***	.131	***
职业阶层^b								
干部					.087	***	.131	***
专业技术人员					.073	***	.127	***
企业主					.327	***	.007	<
办事人员					.028	***	.068	***
就业部门^c								
国有垄断部门					.102	***	.255	***
国有开放部门					.124	***	.175	***
私营开放部门					.075	*	.348	***
其他所有制开放部门					-.061	**	.087	***
控制变量								
长期工 ^d					.306	***	.293	***
城市 (54 个虚拟变量) ^e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截距	5.696	***	6.759	***	5.455	***	6.530	***
方程确定系数 (R ²)	.442		.396		.473		.436	
调整系数 (R ² _{adj})	.440		.393		.471		.432	
个案数	16 887		11 044		16 887		11 044	

注：1 “>” 表示 Z 检验结果，1995 年回归系数显著大于 1988 年回归系数；“<” 表示 1995 年回归系数显著小于 1988 年回归系数（双边检验，p< 0.05）。

2 检验水平：*p< .05；** p< .01；*** p< .001（双边检验）。

3 参照系类别：a 初中毕业；b 工人或未明职业；c 开放部门中的集体企业；d 临时工或其他；e 北京。

我们在模型 2（表 2）中加入了两组结构变量：职业和经济部门。在 1988 年和 1995 年两个年份，与工人相比，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收入都是高的，而且这两个职业群体的相对优势在这 7 年间都在加强：干部的收入优势从 9.1% (e^{0.087}) 上升到 14.0% (e^{0.131})，技术人员的收入优势从 7.6%

($e^{0.073}$) 上升到 13.5% ($e^{0.127}$)。由于干部身份是一个地位权力的指标,而技术人员是专业性人力资本的一个指标,假设 1 到假设 4 在这里又一次得到验证。

市场化与企业家收入的相关性本来是检验市场转型论和与之相悖的理论假设的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 1988 年和 1995 年调查对企业家的定义不一致(参见前文注释),我们很难凭借参数估计的结果来肯定或否定这种相关性。按照表 2 所示,在 1988 年,同其他职业相比,企业家的收入水平最高;但到 1995 年,这一职业群体已失去相对收入优势。这看上去费解,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995 年被定义为“企业家”的受访者中包含了个体户,而 1988 年没有。

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在变化。表 2 显示,同城市集体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相比,国有垄断部门的收入优势由 1988 年的 10.7% ($e^{0.102}$) 上升到 1995 年的 29.0% ($e^{0.225}$), 国有开放部门的收入优势由 13.2% ($e^{0.124}$) 上升到 19.1% ($e^{0.175}$), 私营开放部门的收入优势由 7.8% ($e^{0.075}$) 上升到 41.6% ($e^{0.384}$), 而且这些上升都有统计推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垄断部门在市场化进程中收入增长非常快,以致两个国有部门的收入地位发生了逆转;而集体企业的情况是最糟糕的。这些发现对假设 5—7 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五、地区差别分析: 层级线性模型分析

以上趋势分析是在假定了市场化在各城市进展同质性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中国改革进程的地区不平衡性,我们做一个更切合实际的预设,即假定市场化在各城市进展的异质性,然后运用层级线性模型来估计这种差异对个人层面变量的“收入效应”。这就涉及如何量度市场化的程度。学者们曾用工业增长速度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指标^①,或通过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运行特征的划分来标明市场化的地区级差^②。这些度量方法都不是直接测量市场化。魏昂德指出:如果市场转型是由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来定义的话,那么市场扩张的直接度量方法就是看相对于行政调节,商品、劳动、信贷等要素市场调节的比例。本文基于多维市场化的观点,并参考魏氏的论述,利用现有的城市统计资料,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角度来测量城市的市场化程度(度量指标稍后叙述)。此外,工业增长速度将作为一个曾被使用的城市指标纳入分析,以便比较。这里需要做三点说明。第一,我们每次只把一个城市指标纳入层级线性模型。虽然从理论和技术上说,同时使用这三个指标是可行的,但作为第一次尝试,我们考察单一指标的回归结果。第二,层级分析是一个“横截面”分析,我们选择 1995 年的数据,因为在 90 年代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要快于 80 年代。第三,同前面的趋势分析一样,我们在第一个模型中只纳入个人特质变量,然后加入职业阶层和经济部门变量,使之成为完整的模型。我们将着重解释“宏观—微观”互动系数,因为这些系数反映了城市市场化的指标对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等个人特质的收入效应。

① Yu Xie and Emily Hannum,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950—992.

② See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908—949; William L. 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p. 1042—1059. 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 1063.

劳动力市场化效应

劳动力市场化由一个城市中非国有部门的非农劳动力对国有部门劳动力的比率来度量，这一比率是由 1995 年的国家统计资料计算得出的。虽然改革中国有部门职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就劳动报酬讨价还价的权利，国有企业经理亦获得了辞退职工的权力，但非国有部门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和雇主在这方面的权利更具市场交换的特性，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因此，在我们的指标中，一个城市非国有劳动力的比例高，即标志着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

表 3 总收入自然对数的层级回归模型的微观—宏观交互作用系数（1995 年）

城市层面变量	国有劳动力对 非国有劳动力比率		国外投资对 固定资产投资比率		工业增长指数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	模型 II
	(微观—宏观交互作用系数)					
截距	.059 ^{oo}	.063 ^o	3.343 ^{***}	3.586 ^{***}	.164	.133
个体特征						
年龄	.005 ^{***}	.004 ^o	.154 ^{**}	.081	.045 ^o	.057 ^{**}
年龄平方	.000 ^{***}	-.000 ^{oo}	-.002 ^{***}	-.001 ^o	-.001 ^{**}	-.001 ^{***}
性别 (男性 = 1)	-.002	-.000	-.103	-.013	-.077	-.066
共产党员身份	.010 ^à	-.002	.570 ^{**}	.112	.065	-.028
小学毕业或更低	-.002	-.017	-.470	-.400	-.060	-.058
高中毕业	-.001	-.003	-.042	-.047	-.116	-.085
中专毕业	.026 ^o	.010	.517	-.110	.060	.069
大专或大专以上	.023 ^{oo}	.008	.558	.179	.014	.030
职业特征						
干部		.025 ^{**}		1.275 ^{***}		.174 ^à
专业技术人员		.017		.486 ^à		.125 ^o
企业主		.006		.614		.031
办事人员		.028 ^{***}		.691 ^{**}		.099
就业部门						
国有垄断部门		-.010		-.525 ^o		-.061
国有开放部门		-.012		-.691 ^o		-.021
私营开放部门		-.027		-.207		.208
其他所有制开放部门		-.015		-.257		.229
长期工 (= 1, 其他 = 0)		.006		.087		-.020

注：1. 层级模型的微观层面回归系数在这里没有列出。

2. 检验水平：à p < .10；^o p < .05；^{**} p < .01；^{***} p < .001（双边检验）。

3. 参照系类别同表 2（见表 2 注 3）。

劳动力市场化效应分析的结果见表 3 中的第一、第二列系数。模型 I 显示，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较高的相对收入。党员身份的相对收入也是高的，不过其统计意义不很显著。模型 II 加入了技术人员和干部等虚拟变量，显示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这两个职业群体的相对收入也是高的。由于技术人员通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干部多为党员，这两个变量的收入效应间接体现了教育和党员身份对收入的影响。对这两个回归系数的数量解释是，在一个城市中，非国有部门劳动者对国有部门劳动者的比率如果上升了 1%，而其他条件不变，则技术人员的相对收入将平均提高 1.7% ($e^{0.017}$)，干部的相对收入将平均提高 2.5% ($e^{0.025}$)。需要指出的是，在内地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之间，这一比率的差距相当

大, 约为 50% 或者更高。很明显, 在沿海开放城市中, 劳动力市场在 90 年代初期就已开始活跃。如果说, 前面的趋势分析只是笼统地揭示了 80 年代到 90 年代, 市场导向改革给收入结构带来了变化, 表 3 中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则具体说明,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既提高了人力资本回报, 也提高了政治资本回报。这是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效应的两个假设 (假设 1 和假设 2) 的有力支持。

资本市场化效应

资本市场化由国外投资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来度量, 以城市为单位。这一比率同样来自 1995 年的国家统计资料。要更好地度量资本市场, 可能需要把国外投资和国内私营部门投资加总, 或计算不受行政控制的资本 (包括信贷资金)。但目前无法找到这类数据, 有限的一些数据也不完整。笔者认为本文采用的指标是有效和可信的, 因为如果一个城市吸引了较多的外资, 这个城市的国内私人投资和拥有自主权的企业投资可能也会增多, 资本流动的自由度也较大。这样, 外资比率可以被近似地视为度量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资本市场化效应分析的结果见表 3 中的第三、第四列系数。模型 I 显示, 在外资流入比重较大的城市中, 党员身份的经济回报也较高。虽然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 但不具有统计推论意义。然而, 模型 II 表明, 在吸引外资较多的城市中, 干部身份和技术人员身份的收入都较高。同时, 在这类城市中, 办事人员 (可能相当多在第三产业) 的收入也较高。总的来说, 这些发现证实资本市场化提高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回报, 这与假设 3 和假设 4 的预测是一致的。

工业增长效应

工业增长指数是谢宇和韩怡梅设计的^①, 用来作为 1988 年城市市场化的近似指标^②。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了 1995 年的工业增长指数, 发现该指数与上述两个市场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城市工业增长水平对于党员和教育的收入回报不构成影响 (见表 3, 数字列 5), 但对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有正的作用 (见数字列 6)。可能的解释是: 在工业增长较快的城市, 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需求也较大, 这给干部和技术人员提供了更好的收入机会。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力求从市场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两个方面入手, 把握和解释中国的市场化及其相应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关于经济市场与政治安排的互动, 持“政经双变论”的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视角予以论述。我们在参照这些论述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观点: 第一, 市场化是多维的; 第二, 市场化是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相联系的。市场和政府职能转变互动的观点为考察市场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从 1988 年到 1995 年个人收入决定因素的趋势分析和 1995 年的城市市场化对个人收入效应的分析。在趋势分析中, 市场化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在城市间同步的进程,

① Yu Xie and Emily Hannum,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an. 1996), p. 963.

② “工业增长指数”是我们对谢宇和韩怡梅所采用的城市变量 Z 的命名。按照他们的定义, $Z = \log(GPVI_{1988}/GPVI_{1985})$ 。这里, GPVI 代表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长指数与非国有劳动力比率的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 为 0.314, 与国外投资比率的相关系数为 0.227。非国有劳动力比率和国外投资比率的相关系数为 0.752。

而这 7 年间的时间推移就是市场化的量度。这是一个已经被一些实证研究采用的方法。市场化对个人收入效应的分析采用层级模型，是借鉴了谢宇和韩怡梅的方法，但我们不用经济发展指标来间接度量市场化，而是设计了两个度量市场化的直接指标——劳动力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化指标。这是从多维市场观出发，对市场化进行直接度量的一个新尝试。两个分析的结果都支持了本文的推论：伴随着市场化，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

我们还发现了经济部门分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收入相对于国家垄断经济组织中职工的收入在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市场竞争具有强大威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力量的局限性：这种竞争效应只是在开放的产业中比较明显。需要说明的是，垄断部门迅速增长的收入优势并不是由传统的再分配机制造成的，而是在 1992 年以后的新一轮改革中，这些部门中的经济组织占据了行业垄断的地位，获得了垄断收入。

此外，干部的权力和收入优势与国家再分配的相关性也不大了。到 1995 年，干部的权力基础往往来自对国有组织的控制权，他们的收入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控制的组织的性质、地位以及派生的盈利能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取决于他们的行政级别，他们在国家再分配等级体系中的地位。

虽然从总体上说，上述研究发现不支持市场转型论关于政治资本的推论，由于缺乏有效的企业家和雇主阶层的资料，本文未能对产权变形论做出直接评判。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全国城市从 1988 年到 1995 年收入格局的变化，其内在逻辑是市场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经济职能的演变。毫无疑问，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因素和政府政策造成了中国制度变迁的地区差异，但我们的推测是，相对于社会变革总趋势来说，这种地区差异对收入分配变化的解释力是第二位的。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我们认为，对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收入分配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后果。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市场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不是惟一的；新的政治机制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随市场的发展而弱化。这意味着，转型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模式向“市场社会”并拢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职能的变化。诺斯 (Douglass C. North) 曾经说过，国家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也可能造成社会经济的“人为的衰落”^①。这就是说，由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及其后果是不确定的。在我们看来，诺斯的这一见解也适合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正在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中国。

本文的理论观点和实证发现丰富了关于市场转型及其后果的学术对话。从政治经济双重演变观点来看，经济改革中行政安排的演化是多方面的，而非像市场转型论概括的那样，只是国家再分配制度的衰落。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市场—政府互动”观点强调，在市场化进程中，行政安排变迁的主线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就勾画出了与市场转型论形成鲜明对照的逻辑框架。这一互动观点同时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是产权安排多样化的制度条件，从而把产权变形和行政安排变迁联系起来。这样，政经双变论的理论内涵得以拓展，有助于不同学术观点的整合。此外，由于使用了与市场形态相联系的市场化指标，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比以往的研究发现更接近于真实的“市场效应”，回答了判断人力资本升值的原因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机制的问题。

^①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20.

最后需要指出, 本文遵循的“市场—政府”范式, 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变动的约定俗成的取向。沿着这一取向从事实证研究, 积累和证伪相关的理论知识, 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 这一范式本身存在局限性, 并且这种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经过20多年的改革, 中国的社会转型广泛而深刻; 在新的世纪里, 中国经济也将进一步向世界开放。这样, 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因日趋复杂, 市场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实呼唤着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这也是时代向学术界提出的挑战。

附录:

行业性质划分 (开放或垄断)

行业	性质	行业	性质
1 农林牧渔业	开放	8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	垄断
2 制造业	开放	9 教育、文化艺术	垄断
3 采掘、地质勘探业	开放	10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部分垄断
4 建筑业	开放	11 金融保险业	垄断
5 交通运输、通讯业	部分垄断	12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垄断
6 商贸、餐饮、仓储业	开放	13 其他	部分垄断
7 房地产、公共事业	部分垄断		

注: 1. “交通运输、通讯业”中, 铁路、航空和通讯是国有经济垄断的, 而公路运输和水运是开放的, 因此定义为部分垄断。

2. 房地产业、卫生、教育等对私人投资有限制, 故定义行业7为部分垄断。

3. 科研基本由国有单位承担, 故定义行业10为部分垄断。

4. 卫生体育事业和教育文化事业对国内外私人投资有严格限制, 故定义行业8、行业9为垄断。

5. “其他”包括了经济管理机构, 故定义为部分垄断。

[本文责任编辑: 冯小双]

Differing from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of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ve their own unique features. In light of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e direct investment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from 1983 to 2000, a theoretical model of determinant factors should include the factors of policy variables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 The revised model shows how the size of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is determined by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policy openness, previous capital stock and exchange rate. The salary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from Americ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ut not as great as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model would indicate, because American investment in China is concentrated i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omparison, changes in demand and policy have a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reconditions for sustained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namely expanding market access and the maintaining present levels of foreign exchange, American investment in China will be on the increase.

(7) **Practical Sociology and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Sun Liping* • 83 •

The “theory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has the following four outstanding features:

1. It focuses mainly o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official organizations and systems;
2. Structural features are studied mainly through large scale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3. The theoretical angle is top-down; and
4. The countries undergoing market transformation studied by the Budapest School are mostly in East Europe, especially Hungary. In these societies, market transformat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breakdown of the state system.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research approach to “analyses of practical proces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is research approach focuses on specific practical proces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tries to reac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through studies of its process, mechanisms, techniques and logic. In methodology this approach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in-depth case studies, sees the daily life as a stage of two interactive forces—upward force and downward forces—and synthesizes the mutually opposite “top-down” and “bottom-up” perspectives.

(8) **Market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zing the 1988 and 1995 Urban Household**

Income Surveys

Bian Yanjie Zhang Zhanxin • 97 •

Marketization is one of the hallmarks and major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tremendous changes taken place in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areas?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se changes? Starting from a wish to unfold an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main arguments of American sociologis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ket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is article offers a theory of “interac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al economic functions.” The authors’ statistical analyses uses data from the 1988 and 1995 Urban Household Income Surveys to support their assumptions.

(9)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in Fulfillment of Rights**

Hao Tiechuan • 112 •